

资治通鉴大辞典

通鉴学资料(二)

施丁 沈志华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四) 评论《通鉴》

1. 宋元学者评论

司马温公修《通鉴》，伊川一日问修至何代，温公曰：唐初也。伊川曰：太宗、肃宗端的如何？温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复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温公曰：管仲，孔子与之，某于魏徵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业，此圣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讎，何所取耶？温公竟如旧说。（管仲虽初有过善补者也，魏徵初实无过者也，功业虽多何足法乎？）

（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外书十二》。

予早游温公之门，与公之子康公休缔交义笃，公休尝相告曰：《资治通鉴》之成书，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讫五代则范纯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纯诚粹识，不懈昼夜，不时饮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几有益于天下国家之大治乱，不自辜所志也。其在正史外而有以博约之，楚汉事则司马彪、荀悦、袁宏，南北朝则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李延寿书虽无表志而可观，《太清记》亦时有足采者，《建康实录》犹桀而下无讥焉尔也。唐以来稗官野史，暨夫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幸多存而不敢少忽也。要是柳芳《唐历》为最可喜。呜呼！孰敢以佻心易谈哉！

（宋）晁说之：《送王性之序》，见《嵩山集》卷17。

《长编》者，温公《资治通鉴》稿草之私号也，温公自洛中以所修稿草寄其属官南康军监酒刘道原而自名之欤，抑道原之名欤，道原

日诵万言而勤废饮食寝处，遂忘其身之流落而家寒饿也，其忠愤耿介，当熙宁初不为大丞相毫发少贬者，虽自其天姿亦博学精思之助哉，观斯疑事则其闲远沈粹之躅亦略可见矣。《通鉴》之为书，有贤杰辅相攻坚析微如此，安得不善邪，昔其初不自珍，而公卧病二年之久，家人单弱忧瘁之中，幸而存者，姑五十有五种也。公之子羲仲壮舆，政和戊戌为唐州曹官，录以寄说之东里草堂，初拜嘉而不甚器之，以壮舆作《资治通鉴考异》待其异日之成书也，今壮舆死，已累年斯事已矣，谁能措手，不觉涕泣，无从渍于残缺仅存之书，嗟嗟良友，奕世厚善之意，实存于其中也，重惟壮舆临终属我铭其墓文，难之未就，乃先以摭，予之哀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二十六日戊寅嵩山晁说之题。

（宋）晁说之：《题长编疑事》，见《嵩山集》卷18。

司马温公编修《资治通鉴》，辟刘贡甫、范纯夫、刘道原为属，两汉事则属之贡甫，唐事则属之纯夫，五代事则属之道原，余则公自为之，且润色其大纲。书成。道原复类上古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以前事，为《通鉴前纪》，又将取国朝事为后纪。《前纪》既成，而病，自度后纪之不复可成也，更《前纪》为《外纪》。

（宋）徐 度：《却扫编》卷下。

唐太宗以讖欲尽杀宫中姓武者，李淳风以为不可竟杀，李君羨识有一女子，身长姓武，其明白如此，后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郝处信、褚遂良力谏，初无一语及武氏之讖何也？武氏之变至不可言，司马文正《通鉴》不书怪，独书此讖云。

（宋）邵 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0。

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淳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也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汉淮南王、太史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考异》中无之。

(宋)邵 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0。

《资治通鉴》(先谦案:旧钞讹一)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先谦案:表本十二)右皇(先谦案:旧钞宋)朝治平中,司马光奉诏编集历代君臣事迹,许自辟官属,借以馆阁书籍,在外听以书局自隋。(先谦案:旧钞讹隋。)至元丰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阅,别为《目录》,参考同异,俾归一途,别为《考异》各一编。公自谓精力尽于此书。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御制序以冠其首,且以为贤于荀悦云。公武心好是书,学之有年矣。见其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说,如屈原怀沙自沈,四皓羽翼储君。严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削去不录,然后知公忠信有余,益陋子长之爱奇也。(先谦案:袁本无御制以下八十五字,作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云云,与下《通鉴外纪》文全同,盖误合为一也。)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5,(清)王先谦合校本。

司马丞相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其说辨矣,理则不如是也。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胜数,或在权臣,或在贵戚,近习,或在强藩大将,或在兼并,或在老释。方是时也,上则府库殫乏,下则民力穷粹,自非治世,何代无之。若能尽去数者之弊,守之以悠久,持之以节俭,何止不加赋而上用足哉!虽捐赋以予民,吾知无不足之患矣。彼桑弘羊辈何足以知之,然遂以为无此理,则亦非也。

(宋)陆 游:《书通鉴后》,《渭南文集》卷25。

了斋陈莹中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竞尊王荆公而挤排元祐,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陈闻之,因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训,于是林、自骇异,而谓陈曰:此岂神宗亲制耶!陈曰:谁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陈曰:圣人之学,得于天性,有始有卒,岂有少长之异乎!自辞屈愧叹,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学中敞高阁,不复敢议毁

矣。毁《通鉴》非细事也，诸公未有纪之者，止著于《了斋遗事》中。

（宋）周 焯：《清波杂志》卷9。

初，予与子袁子同为太学官，子袁子录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后一年，子袁子分教严陵。后一年予出守临漳，相见严陵，相劳苦，相乐，且相榘以学。子袁子因出书一编，盖《通鉴》之本末也。予读之，大抵叙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窅而樛，其究遐而迹，其于治乱存亡，盖病之源医之方也。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冷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来，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国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盖安史之乱则林甫之为也，藩镇之乱则令孜之为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则得其医之方矣，此书是也。有国者不可以无此书，前有奸而不察，后有邪而不悟。学者不可以无此书，进有行而无征，退有蓄而无宗。此书也，其入《通鉴》之户欤？虽然，覩人之病，感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于身之病不憚焉，不讳焉，不医之距焉，不医而缪其医焉，古亦稀矣。彼闇而此昭，宜切且于人，纾于身，可哀也夫！

（宋）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见《通鉴纪事本末》卷首。

温公无自节《通鉴》，今所有者，乃伪本，序亦伪作。

（宋）朱 熹撰，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134。

温公谓魏为正统，使当三国时，便去仕魏矣。（升卿）

（宋）朱 熹撰，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134。

问班史、《通鉴》二氏之学如何？曰：读其书自可见。又曰：温公不取孟子，取杨子，至谓王伯无异道。夫王伯之不侔，犹砒砒之于美

玉,故荀卿谓粹而王,驳而伯,孟子为齐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异也。又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着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做论说以断之。(骥)

(宋)朱熹撰,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134。

温公《通鉴》不信四皓辅太子事,谓只是叔孙通谏得行,意谓子房如果此则是胁其父。曰:子房平生之术只是如此,唐太宗从谏亦只是识利害,非诚实,高祖只是识事机,明利害,故见四皓者,辅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为之矣,叔孙通嫡庶之说如何动得他。又谓高祖平生立大功业过人,只是不杀人。温公乃谓高祖杀四人甚异。(事见《考异》)其后一处所在,又部载四人;又不信剧孟事,意谓剧孟何以为轻重,然又载周丘其人极无行,自请于吴去呼召得数万人助吴。如子房、剧孟,皆温公好恶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论以明之可也,岂可以有为其事为褒贬。温公此样处,议论极纯。因论章惇言温公义理不透,曰:温公大处占得多,章小黠何足以知大处。(杨)

(宋)朱熹撰,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134。

《通鉴》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汉书》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

(宋)朱熹撰,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134。

通鉴例,每一年或数次改年号者,只取后一号,故石晋冬始篡,而以此年系之。曾问吕丈,吕丈曰:到此亦须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系年,下面注所改年号。

(宋)朱熹撰,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134。

胡致堂去:《通鉴》久未成书,或言温公利餐钱,故迟迟,温公遂急结束了,故唐五代多繁冗。(见管见后唐庄宗六月甲午条下方)

(宋)朱熹撰,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134。

蒙教扬雄、荀彧二事,按温公旧例,凡莽臣皆书死,如太师王舜之类,独于扬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称而以卒书,似涉曲笔,不免却按本

例书之曰，葬大夫扬雄死，以为足以警夫畏死失节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笔之正例也。

（宋）朱熹：《答尤延之（袤）》《朱子文集》卷37。

臣仰奉圣训，读《资治通鉴》，有以见陛下务考周秦以来兴亡治乱之迹，以为鉴戒，此诚圣学之要也。司马光为此书，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三晋为诸侯，以为天子自坏其纪纲，周衰既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极论札与名分最详，以为此书首篇诚足为后世之深戒。然臣尝考之此书之作，又有深意，自古史法皆以编年，《春秋》是也。自司马迁《史记》创为纪传之体，无复编年之作，荀悦、袁宏书又不显，光之此书，实继《左氏传》，而不敢显言之。《春秋》一经、《公羊》止获麟，鲁哀公之十四年也；《左氏》经终孔丘卒，哀公之十六年也，而传终哀公之二十七年，其末篇叙知伯事，其略曰：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甚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悞，故韩魏反而丧之，注谓在《春秋》后二十七年。臣考获麟雨《春秋》绝笔，绝笔二年而孔子卒，又七十六年，是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而三晋为诸侯，《通鉴》之始也。其实三晋之分知伯，在周贞定王之十六年、去孔子才二十七年，《左氏传》以三晋事终，《通鉴》以三晋事始，其实继《左氏传》编年之法，此读《通鉴》者之所当知也。又《通鉴》首卷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困敦，太岁在戊曰著雍，在寅曰摄提格，在壬曰玄黓，在子曰困敦。光岂不能书戊寅壬子、而直以此纪年者，《尔雅·释天篇》岁阳岁阴甚详，其以甲子乙丑云者，在书法止可以纪日，光之书此，非好为泥古、盖其岁阳岁阴，书法当然也。伏乞睿照。

（宋）楼钥：《讲筵论资治通鉴》《攻媿集》卷25。

予尝与师友论《通鉴》汉高祖元年十月下，不书五星聚东井之文，此正温公明汉史傅会之失也。魏高允谓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旦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方出于寅北，何因背日而行。崔浩因之以验其言，则星乃前三月聚东井，非十月也。是时高祖未入关，不足为兴王之符，史臣傅会明矣。唐武德初，二星聚于

奎,亦以为唐兴之应,然是时唐已革隋,其应后时矣。天宝大历间,或五星聚于尾箕,或再出于东方,皆青齐之分,然是时乃有安史、朱泚、怀恩之变,谓星为唐而聚耶非也?史臣侈瑞以同傅会,前后一律也。故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去岁侍讲金华,当时讲官诵《通鉴》至汉高祖元年事,予亦尝推明此说。兹来成都,同年张季长示以温公所修通鉴稿,则高祖元年稿也,旧史五星聚东井盖为异事,而温公独削之弗录,是盖《春秋》笔也,岂后史臣所能万一哉!人之观《通鉴》者当自识之。

(宋)袁说友:《跋张季长同年所藏司马温公通鉴汉元年稿》,见《南宋文范》卷61。

观司马公《通鉴》草纸,阔狭不侔,有翦为数寸阔者,两面密书,时有涂改处,字尤端楷。观此则想象萧公史草,令人精神飞越,恨不一披元笔。

(宋)高似孙:《史略》四。

《资治通鉴》但载梓人及郭驼橐传,以为其文之有理者,其识见取舍,固有在云。

(宋)高似孙:《史略》四。

温公进资治通鉴表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其与宋次道书曰: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至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诂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十(阙)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阙)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须更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其费功如此。温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书。今学者观《通鉴》,往往以为编年之法,然一事用三四处处纂成,是其为功大矣,不观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鉴》之功绩也。《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

(宋)高似孙:《纬略》卷12。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

丞相温公河内司马光君实撰。初光尝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八卷以进，英宗悦之，遂命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王迄乎五代，就秘阁置局，神宗御制序，赐名《资治通鉴》，及补外，听以书局自随。元丰七年书成，上曰：贤于荀悦《汉纪》远矣。《目录》仿《史记》年表，年经国纬，用刘羲叟长历气朔而撮新书精要散于其中，《考异》参诸家异同，正其谬误而归于一，总三百五十四卷。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

英宗治平中，勅司马光編集历代君臣事迹，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祕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6。

神宗御制序。神宗序略云，英考留神载籍，万几之暇，未尝费卷。乃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王，迄于五代。光之志以谓周道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自威烈王陪臣执命，韩、魏、赵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诗言“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志焉。又曰：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摹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辞令渊源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6。

《通鉴》之得，文帝时晁错以贤良对策也，而一辞不录，武帝时董仲舒汉廷之对，三策所陈首尾略具，盖温公之意，以为文帝开贤良之科正欲闻切直之论，而晁错未免以五帝神圣其臣莫及谏其君，仲舒之辞正切直所以格君心而裨圣德者多矣，其去取之意或者在此焉。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6。

姚崇十事之谏非不切直也,《通鉴》则一言不录,独魏郑公之谏疏与陆宣公之奏议纪之特详切。以唐史郑公宣公列传较之,如信小人而疑君子之言,从谏不逮,往年之言皆不取诸传而取诸谏录。如遣使振抚之言,内节财赋之言,皆不取诸传而取于奏议,温公去取之意,岂不以崇以十事要君非忠爱也,而魏、陆拳拳之心,今以其言皆可考也,故录之特详欤?鲁仲连却秦军,此谈者之夸大耳,故不书。四皓之立太子,乃立党以制父耳,故不载。剧孟以侠显而不录,姚崇十事以要君而不纪。(一先仁义,二不求逐功,三中官预事,四罢邪封,五请行佞倖法,六塞贡献,七绝造寺观,八礼大臣,九容谏臣,十请书外戚之祸于史。)鲁肃以荆州借先主而曹操闻之坠笔,其事皆不书于《通鉴》,而于《考异》有焉。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6。

陈瓘自言因读《通鉴》然后知司马文正公之相业也,此书编年纪事先后有伦,凡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若登乎乔岳,天宇澄清,周顾四方悉来献状,虽调元宰物辅相弥纶之业未能窥测,亦信其为典刑之总会矣。(胡文定公《通鉴举要补遗》)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6。

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如隋义宁三年便称唐武德元年)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论,妖异有所警戒,谈谐有所补益者皆存之,余乃删去。(范祖禹得司马公书云)又曰: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天下,传祚后世,子孙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今全用天子法临统诸国,其余蜀、魏、吴、宋、齐、梁、陈、后魏、秦、夏、凉、燕、北齐、后周、五代诸国,地丑德齐不能相一,名号匹敌,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国法。至如玄德虽曰承汉,然属族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字,亦犹宋高祖自称楚元王后,李昉自称吴王恪后,是非难明,今并同之列国,不得以汉光武、晋元帝例为比(温公与刘道原书)。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6。

公尝谓恕曰: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

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做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恕曰：司马迁以良史之才，叙黄帝至秦汉兴亡治乱，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寿总八朝为《南北史》，而言词卑弱义例烦杂，书言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复《统史》世近亡軼，不足称也。公欲以文章论议，成历世大典。高勋美德褒赞流于万世，元凶宿奸贬黜甚于诛殛，上可继仲尼之经，丘明之传，司马迁安可比拟，苟悦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学士为英宗皇帝侍讲，受诏修历代君臣事迹，恕蒙辟置史局，尝请于公，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恕乃知贤人著书，尊避圣人也，始知儒者可以法矣。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6。

初，温公以载籍烦多，人主不能遍览，乃约战匡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八卷，上之。英宗命续其事。治平中，辟官属，编集前后汉则刘贡父，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晁以道《送王生之序》，李焘《通鉴序》。初祖禹修唐长编盖六百卷，今删止八十卷。）公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一书，（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计二百九十四卷。）神宗制序，赐名《资治通鉴》，命经筵进读；公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参考群书，评其异同，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公又患《通鉴》其书浩大，难于领略，而《目录》第撮精要之语，无复首尾，晚乃著《通鉴举要》八十卷。又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诸国治乱，集以为国，每年一行，六十行为一重，六重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离为五卷，治平元年上之，而今本六卷，盖自威烈二十二年，上距共和元年，增多四百三十有八年，（见威烈王二十二年）实光晚年所修，是为《通鉴历年图》。（馆阁书目）又自宋一天下，按于熙宁著为《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

而上,伏牺书契已来,论纂成书,为《稽古录》(二十卷,稽古录序)。

(宋)章如愚:《通鉴类》,《群书考索》卷16。

《通鉴》之失,项羽垓下之败,不敢复还彭城而东走乌江,正以灌婴引兵定淮地,下彭城,已覆其国都矣。温公虽载汉败羽垓下而不载灌婴下彭城之事,岂亦有所遗乎?汉自七国之变,务抑诸侯,独严安上书武帝,论州郡列城数十,形束坏制带胁诸侯,非宗室之利,是盖有见于安危之端者,而温公《通鉴》削而不载,岂非有所缺乎?(刘昭以为,严安慷慨发愤,谓千里之职即古之强国,虑非安本无穷之计,其后汉家以中外殫微不降价序以运天下。)胡致堂《管见》谓,田千秋薨,二年不拜丞相,是霍光少昭帝也;杨敞薨,逾月而拜蔡义,是霍光不敢少宣帝也;其言善矣,然考之《百官表》,田千秋之后即拜王诋为相,《通鉴》失于登载,遂使致堂发此议耳。(年纪参异)

王嘉上疏言,元帝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通鉴》书都内钱而刊去下两语,岂温公以上为总结而下为分别而言之乎?故总云都内钱四十万万耳,殊不知都内官名也。《食货志》云:武帝募民田南夷入粟郡官,而内受钱于都内。都内掌天下之经费,水衡、少府掌天子之私藏,嘉之所言谓经费私藏皆富耳。刘先主即皇帝位于武担之南,而温公以昭烈于中山靖王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是非难辨,遂使抑之不得绍汉统,则未知其去取之意也,昔诸葛亮称玄德为帝室之胄,岂凭虚无据云耳。温公宽宥曹操,谓操取天下于群盗,非取之汉室,抑退蜀之主相,不少假于孔明北伐,亦以入寇书之,亦独何哉!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其编目叙事皆谓蜀先主为昭烈皇帝。观此则温公之失可见矣。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较,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此段见《平准书》,而《通鉴》载于景帝后三年,按《平准书》云上即位岁,汉兴七十年余,正谓武帝。(汉帝纪年考异)汉之薛包、茅容等,旧史止附别传,《通鉴》具载事迹,不

可谓不广记；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称屈原《离骚》与日月争光，而公乃不载，历代文苑隐传直十削去七八，会要前例并存。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16。

古今载籍之文，存于世者多矣。苟不知所决择而欲遍观之，则穷年不能究其辞，没世不能通其义，是犹入海算沙，成功何年！善乎孟子之言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知，急先务也。”大抵士君子之学，期于适用而已；驰骛乎高远，陷溺乎异端，放浪于词华，皆不足谓之学矣。《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命》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若此者可谓适用之学矣。

前修司马文正公，遍阅历代旧史，旁采诸家传记，删繁去冗，举要提纲，纂成《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下终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间，贤君、令主、忠臣、义士、志士、仁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其于前言往行，盖兼蓄而不遗矣；其于裁量庶事，盖拟议而有准矣。士之生也，苟无意于斯世则已；如其抱负器业，未甘空老明时，将以奋发而有所为也，其于是书，可不熟读而深考之乎！

朝廷悯庠序之荒芜，叹人材之衰少，乃于京师创立兴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咸给禄廩，召集良工，刻刻诸经子史版本，颁布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可谓知时事之缓急而审适用之先务者矣。

噫！遐乡小邑，虽有长材秀民，向慕于学而无书可读，惘默以空老者多矣。是书一出，其为天下福泽利益，可胜道哉！昔圯上老人出袖中一书，而留侯为万乘师；穆伯长以《昌黎文集》镂板，而天下文风遂变。今是书一布，不及十年，而国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观之矣。

（元）王 磐：《兴文署所刊资治通鉴序》。

《跋司马温公修通鉴草》：余姚徐氏藏司马文正公即范忠宣手帖修通鉴稿一纸，凡四百五十三字，无一笔作草，则其忠信诚懇根于其中者可知已。永昌元年其岁壬午，晋元帝即位之五年也，自正月王

敦将作乱至十二月慕容皝入令支而还，每事第书发端一二字或四五字，其下则以云云摄之，校今《通鉴》，是年所书凡目时有异同，此或初稿而后更删定之欤！始公辟官置局，前后汉则刘贡父，自三国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淳父，至于削繁举要必经公手乃定。此永昌一年事，公不以属道原，而手自起草，何欤？然则文正忠宜之手泽所存，犹足企想。元祐一时际会之盛，岂固以翰墨争长为可传哉。

（元）柳贯：《待制集》卷18。

《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晁氏曰：皇朝治平中，司马光奉诏編集历代君臣事迹，许自辟官属，借以馆阁书籍，在外听以书局自随，至元丰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阅，别为《目录》。参考异同，俾归一途，别为《考异》，各一编。公自谓精力尽于此书。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御制《序》以冠其首，且以为贤于荀悦云。公武心好是书，学之有年矣，见其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事，如屈原怀沙自沉，四皓羽翼储君，严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皆削去不录，然后知公忠信有余，盖陋子长之爱奇也。

陈氏曰：初光尝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八卷以进、英宗悦之、遂命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王，迄于五代，《目录》做史记年表，年经国纬，用刘义叟长历气朔，而撮新书精要散于其中。《考异》参诸家异同，正其谬误，而归于一。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说之曰：此书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其在正史外，楚汉事，则司马彪、荀悦、袁宏，南北朝，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李延寿《南北史》、《太清记》亦足采，《建康实录》以下，无议焉。柳芳《唐历》最可喜，唐以来稗官野史，暨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亦不敢忽也。苟不先读正史，则《资治通鉴》果何有邪。

武夷胡氏曰：昔闻赠谏大夫陈公言，因读《资治通鉴》，然后知司马文正公之有相业也。余自志学以来，涉猎史篇，文辞汗漫，莫知统纪，徒费精神，而无所获，及读此书，编年纪事先后有伦，凡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若登乎乔岳，天宇澄清，周顾四方，悉来献状，虽调元宰物辅相弥纶之业未能窥测，亦信其为典刑之总会矣。

致堂胡氏曰：司马公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岁月既久，又数应诏上书论新法之害，小人欲中伤之，而光行义无可訾者，乃倡为浮言，谓书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耳。既而承受中贵人阴行检校，乃知初虽有此言，而未尝请也。光于是严课程，省人事，促修成书，其表有云，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简牍盈积，浩如渊海，其间抵牾不敢自保。今读其书，盖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光以议论不合，辞执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为，甘就冗散編集旧史，尽愿忠之志。而俭险细夫顾谓眷恋匪颂之人，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为辞十而受万乎！小人以己臆度君子，类皆如是，夫編集旧史欲人君学者便于观览，其功不细矣。以久之故，尚有才口，又沉矫世拂俗，兴复先王之治哉。呜呼，悲夫。

高氏《纬略》曰：公与宋次道书曰，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其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其费工如此。温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书，今学者观《通鉴》，往往以为编年之法，然则一事用三四处出处纂成，是其为功大矣。不观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鉴》之功绩也。《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

容斋洪氏《随笔》曰：司马公修《资治通鉴》，辟范梦得为官属，尝以手帖论撰述之要，大抵欲如《左传》叙事之体。又云，凡年号皆以

后来者为定,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更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故此书用以为法,然究其所穷,颇有窒而不通之处。公意正以《春秋》定公为例,于未即位即书正月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则次年之事不得复系于昭,故定虽未立,自当追书,然经文至简,不过一二十字,一览可以了解,若《通鉴》则不侔、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便以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义宁,后一卷则为唐高祖,盖凡涉历三卷,而炀帝固存,方书其在江都时事。明皇后卷之首标为肃宗至德无载,至一卷之半,方书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庄宗同光四年便系于天成,以为明宗,而卷内书命李嗣源讨邺,至次卷首庄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标为晋高祖,而卷内书石敬瑭反至卷末始为晋天福。凡此之类,殊费分说。此外,如晋宋诸胡僭国,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纤悉必书,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观镇远将军平舒侯燕风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无关于社稷治乱,而周勃薨乃不书。及书汉章帝行幸长安,进幸槐里岐山,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十二月丁亥还宫,又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夏四月乙卯还宫。又书魏主七月戊子如鱼池,登青冈原,甲午还宫,八月乙亥如弥泽,甲寅登牛头山,甲子还宫。如此行役,无岁无之,皆可省也。

巽岩李氏曰:左丘明传《春秋》、自隐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为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年,为十七卷,年近则事详,远则略,理势固然,无足怪者。温公与范太史议修唐纪,初约为八十卷,此帖云已及百卷。既而卒为八十卷,删削之功盛矣。卷数细事,前辈相与平章犹严若此,则其他肯轻下笔哉。吁!可敬畏也。然今以唐纪视汉纪,其纸叶盖多八九,视周纪滋益多于斯文奚累焉。而或者弗察,强以繁省论文,晋张辅遽谓孟坚不及子长;孟坚不及子长固也,岂在文之繁省乎,此儿童之见耳。

先公曰：张新叟言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黄鲁直阅数百卷，讫无一字草书。（见李巽岩集）此温公所谓平生精力尽于此书也。如人之不能读何，公尝谓吾此书惟王胜之尝读一遍，余人不能数卷已倦睡矣，公此书历英宗神宗二世，凡十九年而书成。

（元）马端端：《文献通考》卷193。

2. 胡寅评论

司马氏《考异》曰：“……（按：引《考异》不信张耳言四皓事）”

善乎子房之能纳说也，不先事而强聒，不后事而失机，不问则不言，有言则必当其可，故听之易而用之不难也。评之者曰：汉业存亡在俯仰间，而留侯于此每从容焉，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复道见沙中之聚，始言雍齿之侯，善言子房矣。至于引致四皓，羽翼储宫，方之齐桓公会合八国，定王世子于首止，事简而力不劳，其绩尤伟耳！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谓审有此，是子房为子结党以制父也。夫高帝驾馭群雄，独立为帝，其材气雄杰，岂四老人所能抗，而汉庭大臣力谏之强，岂不贤于四人之助乎？是盖未尝知圣人深许首止之盟，而称管仲相齐一匡天下之美也。《易》于坎之九二曰：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先贤以子房四皓之事明之曰：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欲立赵王如意者，帝之所蔽也；闻四老人之贤，愿见而莫能致者，其心之所明也。子房用其明以去其蔽，是自牖纳约者，宜其从之之速也。夫先贤之学，非世之君子之所能及也。今当据旧史详载之，以见高帝免废嫡之愆，汉家有父子之序，非子房其谁赖？且子房时然后言，言必有益，而前史谓“良与上言前后甚多，非天下所以治乱安危者，故不载”。呜呼！良岂有费（疑作“废”）言哉！

（宋）胡寅：《读史管见》卷1。